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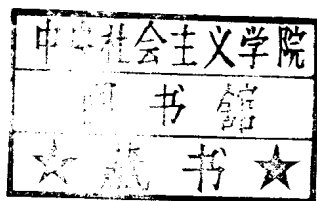
两浙山水·历史·人物

王煊城著



55526

两
浙
山
水
·
历
史
·
人
物



两浙山水·历史·人物

王煊城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4.25 字数78,000 印数1—7,3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103·100

定 价： 0.30 元

前 言

近两年来，喜读有关浙江的历史、地理书籍，随读随摘，积累了一些资料；偶有所感，则组织成篇，以记叙一人、一事或一处为主，间以体会或评论，作为读书消化的一法，并希冀给青少年们以一些帮助，包括思想上的和知识性的。

爱家乡、爱祖国、爱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常有一致之处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对我们现在的工作，会有所启发。壮丽山河抚育人，乾坤正气激励人。近处的、本省的山水、历史、人物尤使人感到亲切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，但囿于才思和文笔，表达不好，不知读者是否也喜欢呢？

吴晗先生从四十年代起，就很重视历史科学的通俗化工作，解放以后，他工作很忙，还担负起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任务，在党的支持下，至六十年代中，已出版了几十册，群众欢迎，效果良好，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学了历史，有所体会，对青年人理直气壮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十分重要，老年人应负起这个责任，义不容辞。我写历史小品，其中一个原因，也就是纪念吴晗先生。

这一小册子的内容，对照书名，是很不全面的。宋朝和近代史的人物故事较多，金华地区的内容较多，其他则很少了。这是因为自己是金华地区的人，平时又比较喜欢学习宋史和近代史，所见所闻，所知所感，就不免有所偏爱和受到限制了。以后写，注意面就该大些，以能反映浙江史地的概貌才好。

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：因非论文，材料出处并未全部注明，也少考证，只是凭爱好和个人水平采用。

王煊城

1983.1.

K2955
2



200227566

目 录

前言	
回忆吴晗同志	[1]
张俊为何跪墓前	[7]
从火腿想到宗泽	[13]
道学与严蕊	[17]
江心屿·王十朋·《荆钗记》	[21]
从郁达夫诗评陈亮说起	[25]
韩侂胄与陆游	[31]
潘季驯和《河防一览》	[36]
清初戏曲家李渔	[40]
侍王和侍王府	[44]
杰出的女诗人秋瑾	[49]
张恭传奇	[57]
陶成章和《龙华会章程》	[61]
近代浙江女报人	[68]
一代报人邵飘萍	[72]
经亨颐与《非孝》事件	[77]
淳安的两个皇帝	[82]
浙东军民的抗英斗争	[86]
义乌多文人	[91]
《越难志》简介	[96]

抗战时的碧湖	〔 101 〕
漫说诗社	〔 106 〕
八咏楼和八咏滩	〔 110 〕
“金华八洞”	〔 114 〕
浙江的几处水泉	〔 118 〕
奇绝方岩	〔 122 〕
东湖景色与众不同	〔 126 〕

回忆吴晗同志

1941年的秋天，我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。大学一年级学生，《中国通史》是必修课，当时开这门课的是钱穆、吴晗、孙毓棠三位教授。在老同学的帮助下，我选了吴晗先生的课。上课地点是在离校本部约二里许的昆华食堂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，几十条凳子，听课的人却有二、三百。同学们大多自带凳子（从二里外的本部带来），有的是席地而坐，杂乱无章地挤满一堂，但是只要一上起课来，即鸦雀无声，只听得笔尖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。大家记笔记十分认真，吴晗先生的讲课，每讲一节，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。他身材不高，却很结实，讲课响亮有力，语句十分简洁，逻辑性很强，见解精辟，时有警句。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，精力充沛，讲课从不坐着，每次都站着连讲三小时，有时中间都不休息。同学们说听这三小时课是享受，老师讲得精神，学生越听越兴奋，都象游泳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海洋中。吴先生很重视讲述历代的典章制度，讲得条理分明，重点突出，抓住实质，评价也实事求是，听课者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。他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材

料翔实，是非、爱憎分明，对农民起义领袖、爱国将领和政治改革的人物，评价很高，如对王安石、岳飞、李自成等，吴先生都是热情赞扬的，当然也恰当地指出历史的局限性。这样的课能使学生关心国事，提高爱国热忱。他又讲得生动，深入浅出，给人印象深刻，至今不忘。

吴先生和我是老乡，1942年的春节，我第一次到他的住处拜访，那天是大年初二，陪我去的是北大印刷所的一位杨先生，也是义乌人。当时，吴先生和他的夫人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，厨房在楼梯口，一间房子用旧布隔成两半，外间吃饭、会客、工作，里间主要是一张床。他的夫人袁震先生长期患病，不能起床，据说患的是脊髓结核病，当时，这种病是很难治好的。我和杨先生进了房，吴先生正准备做饭，他先招呼我们坐好，谈了些故乡义乌的消息，然后就说：

“今天年初二，按照乡风，春节期间走访亲友，应在这里吃饭。你们在昆明又没有家，就在我这里算过年吧。”谈了二、三十分钟，吴先生介绍我们和袁震先生见面，自己就去做饭了。做完饭，吴先生先拿饭给袁震先生吃，多年来都是这样的。袁先生是吴先生清华求学时的同学，也是历史学家。她长期卧病在床，没有儿女，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，始终不渝，联大师生谈起来都十分钦佩。吴先生料理完袁先生的吃饭，才同我们一起吃饭、谈话，他主动地问起：“家乡沦陷了，你的读书费用怎么办呢？”我沉默着，他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你找找工作看，兼点差，维持学费。

但是，一下子不一定找得到，暂时先每月到我这里拿一点，杨先生也凑一点，将就过去再说。”说得那么诚恳、落实，我心里一股热流，什么也说不出，感激地望着他点头。以后三年多的大学生活，大体上就按照吴先生说的意见度过来了。吴先生对朋友热心，对青年关怀，对爱人忠贞不渝，道德文章，凡认识他的人一致称道。吴先生呵！人们说你是一代名师，青年楷模，你是当之无愧的。

吴晗先生在清华求学时代，已经是一位严肃的学者，他那时的著作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和《两浙藏书家史略》等已经蜚声史坛。后来，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和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极端愤恨，他终于走出书房，投身民主革命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被日寇占领前夕，国民党反动派弃在港的许多知名学者与爱国人士于不顾，却派飞机把孔祥熙家的几条洋狗也从香港抢救到重庆，这自然引起广大人民的公愤。西南联大的学生首先发难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倒孔运动”。运动一开始，吴先生就坚决站在进步学生方面，积极支持，他在课堂上激动地讲：“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（指贾似道），今天有个飞狗院长（指行政院长孔祥熙），真是无独有偶。”此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吴晗先生就奋不顾身、一往直前地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，他不知疲倦地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座谈会、讨论会、报告会，热情地指导着进步学生的刊物、墙报和社团活动。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作战，进步活动的场所，几乎总有他们出

现，听得见他们热情、宏亮和精彩的讲演，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，大义凛然，无所畏惧。同学们称他们一个是雄狮，一个是猛虎。许多青年都从他们那里受到激励，看清方向，从而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路。

抗战时的教授待遇低，生活是很清苦的。吴先生的夫人长年生病，他还经常要汇钱给义乌的老父，另外，还有几个弟妹从家乡到昆明求学，也要由他供给费用。他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。他喜欢吸烟，需要量很大，为了省钱，他常到拓东路大桥头去买土制香烟，五十支一卷，一条纸束着，什么牌子都没有的，昆明人叫“无牌”香烟。吴先生喜欢买书、藏书、读书，求学时代就常巡视北京的旧书摊，偶得一卷，则欣喜若狂。但在昆明的贫困生活使他不得不时有割爱，陆续卖去一部分书籍。有一次，大概是1944年的下半年吧，我在翠湖边遇见吴先生，他手拿着几十卷的线装书，往市区走去，我知道是送到旧书店去的，我说：“太可惜了！”吴先生说：“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，千家驹先生被困在桂林，十分需要钱，大家在凑合接济他。书，以后好再买的。”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，总是先想到别人，特别是关怀、帮助年青人，想得周到，照顾全面，但在照顾中他又有严格要求。1945年上半年，我读完联大，暑假时到一个美军基地去当雇员翻译，九月，抗日战争结束，我回到了昆明，第二天，我就去看吴晗先生，送给他一条骆驼牌香烟和几块巧克力糖。他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也发洋财了吧。”下午，他拿

着原物到我的住处，环视四周，象寻找什么。我懂了，把我仅有的一只破箱子打开给他看，箱内还有一条香烟，几件旧衣，我说：“我的洋财尽在箱中了。”他高兴了，又在眼镜里眯着眼睛，说：“晚上到我家里吃饭吧。”拿起烟和糖走了。他是那样纯真，那样坦率，那样自恃，当时我既高兴又激动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穷，要穷得有骨气，不能随波逐流，不能利欲熏心。吴先生以行动表率，善意而严格地要求他的学生们，和吴先生接触过的同学都感到终身难忘。

我是学经济的，但在吴晗先生的影响下，也喜爱起历史来了。从大学三年级时候起，我陆续写了儿篇历史论文，吴先生都提了意见，作了修改，还尽可能的介绍给有关方面发表。我拿毕业时写的论文《论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》，请他指教，他说：“这方面我了解不多，你去找潘光旦先生吧，我打招呼，他会给你指点的。”在学术问题上，他实事求是，不喜欢相互吹捧，却能“文人相重”。对青年人，他鼓励、帮助，但从不过奖，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你能写写文章，但得多读书呀。”意思是不要急于求成，还得多练基本功。这个基本功，首先应该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，吴先生没有向我“说教”，只是在几天以后，给了我两本小册子，说：“你仔细看看吧。我看过了，得益很大。”这两本书就是毛泽东同志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朱德同志的《论解放区战场》，其中一本我记得还是油印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列主义与中国

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论著。当时不少联大同学都这样受到吴晗先生的启发和教益，接触了新知，开扩了眼界，整理思路，认清前途。吴晗先生又是一位善做青年工作的、启蒙思想的教育家。

在中国的近代、现代史上，为国为民的志士仁人众多、灿烂若繁星，吴晗先生是其中之一。这样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，坚强的民主战士，一代青年的良师，对党、对人民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战士，最后的结局竟惨死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魔爪之下。今天，千秋功罪，已有定论，但是我们总感到十分哀痛，惋惜他再不能以他富有文采的史笔、满腔忠愤的豪情，来记录这伟大时代的声音，来谱写这日月光华、万物向荣的春天。

张俊为何跪墓前

杭州岳飞墓前跪着四个用生铁铸成的千古罪人的像，就是秦桧、王氏、万俟卨和张俊。前三名的罪行，人们大多知道，而张俊是谁？为何也跪着？

张俊在南宋初年的军队中，是资老位高的大将，还是岳飞的老上级。南宋四大将，或称“张韩刘岳”，或称“韩岳刘张”，总之都有张俊的份儿。

论战功，张俊抗金有十几年，打过不少的仗，也打过一些胜仗。如《宋史》载，一一四〇年张俊“有永州、亳州之捷”。宋孝宗乾道二年，定十三处“中兴战功”，居然把“张俊明州”列为第一。这是由于张俊善于虚报和冒功，又因当时秦桧余党尚存，非但高抬张俊，且把岳飞排除在外，所以并非公论。《系年要录》则说得比较公正：“张俊明州，仅能少抗，奈何敌未至数十里间，而引兵先遁乎。”^①总论张俊战功，不能说没有，但“少抗”二字大概是符合实际的。

论实力，张俊经常统领几万人或十几万人，而且也有一支骨干队伍，曰张家军。但这个“张家军”的素质和“岳家军”大不一样。如一二九年十二月

“俊兵在明（州），乘贼先而恣掠虏。时城中人家少，遂出城，以清野为名，环城三十里居民，皆遭其焚劫。或以金帛牛酒饷之，幸免。与纷争，杀之。”②又“张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奔避山谷。”③军纪如此之坏，百姓自然痛恨。而对纪律严明、斗志旺盛的“岳家军”，百姓则报之以热烈欢迎。青年将领岳飞战功卓著，声名大盛，在当时军人中，成为一时翘楚。飞又豪爽，曾当众议论张俊：

“张宣抚（俊），飞之旧帅也，其人暴而寡谋。”④老将张俊不自检点，反而对岳飞嫉妒丛生，早伏凶机。《系年要录》说张、岳、韩三军“相视如仇讎，相防如寇盗，自既不能立功，但恐他人立功，平日就矛盾如此。”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是张俊。

张俊贪得无厌，爱钱如命。他因贪污、搜刮而成为大地主、大富豪。史称“俊喜殖产，其罢兵而归也，岁收租米六十万斛”。⑤他还要求朝廷免除他家应缴赋税。他极富有，秦桧向他敲竹杠“借钱”，张俊一下子就拿出一千万缗。临安艺人说书，讥笑张俊是坐在钱眼子里的。他家（即“张循王府”）姬仆成群，豪华无比，又欺压良民，占人田地，煞是临安一霸。张俊本质如此，在紧要关头出卖灵魂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但是张俊堕落成为千古罪人，关键时刻还是在——一四一年初。淮西战役以后，权奸秦桧为扫清投降卖国的道路，决心解除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三大将的兵权。他用“调虎离山”计，把三大将召到临安，封韩

世忠、张俊为“枢密使”，岳飞为“枢密副使”，实际是把他们扣留朝廷，使之有职无权。这时，三人的表现是“世忠既拜，乃除一字巾，出入以兵自卫。飞又开襟，故作雍容之状。惟张俊听其自然，故桧不深致疑”。⑥张俊非但俯首听命，且善于投机取巧，

“俊知桧欲罢兵，首请所部隶御前，且力赞和议”。⑦于是秦桧大喜，又以利诱之，许张俊事成后独掌兵权。张俊利欲熏心，从此卖身投靠，成为秦桧卖国集团的骨干分子。

韩世忠、岳飞二人虽留朝廷，但仍力主抗金，“韩家军”、“岳家军”也留在原地未动，分驻楚州、襄阳重镇，使金兵胆寒。秦桧集团的投降活动，也因此仍然阻碍重重。秦桧、张俊密谋解散韩、岳的军队，方法是“各个击破”。原决定先向韩世忠开刀，命张俊和岳飞借检阅为名，同去楚州解决“韩家军”。岳飞坚决不干，并义正辞严地当面顶撞了张俊，又迅速将秦桧诬韩的阴谋通知了韩世忠。第一步计划破产了，这使张俊老羞成怒，恨飞入骨，决意报复，将矛头先对准岳飞。他一面倒打一耙，造谣说岳飞主张放弃楚州；一面将岳飞通报韩世忠之事向秦桧告密。这时，金兀术又来信促秦桧：“尔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。必杀飞，始可和。”⑧秦桧遂决意杀飞，就着手制造起一场骇人听闻的千古奇冤。宋高宗赵构也无意抗金，但求苟安，于是听任秦桧集团酿造冤狱，岳飞危矣。

谣言满天飞，诬告四方来。秦桧的党羽万俟卨、

罗汝楫、何铸等几乎倾巢而出，一齐起来“交章弹劾”岳飞：什么淮西战役，岳飞抗命而逗留不进呀；岳飞主张放弃楚州，退守长江呀；什么“颓废堕落”、“沮丧士气，动摇军心”呀，真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但这些“罪状”还不能把岳飞整死，于是秦桧集团就使用了最凶狠毒辣的一着，诬陷岳飞要搞“兵变”，要“造反”，必欲置岳飞于死地。

这一着就由张俊出面，收买岳飞的部下王俊（又名王雕儿）来执行。“王俊者，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转资，晚以裨将而妄讐主帅，遂饔富贵。”^⑨这是一个专以告密、损害别人而向上爬的坏蛋。他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控告状，诬告岳飞的部将张宪图谋窃据襄阳，目的是叛变朝廷，夺回岳飞兵权，等等，而指使者又是岳飞的儿子岳云。这就捏造了一个以岳飞为首的三人“谋反集团”。“谋反”罪是能置人死地的，于是张俊捕到张宪，严刑拷打。张宪是条硬汉子，宁死不屈，张俊就造了一个假供状，拿给秦桧，由秦桧下令逮捕了岳飞父子。接下去是秦桧主谋、王氏献计、万俟卨充当打手，终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害死了岳飞父子和张宪。

造成这一大冤狱的诬告者，“首状”虽出自王俊，主犯实是张俊，指使者当然是秦桧。明人陈继儒《跋岳武穆手札》说：“绍兴十一年（一一四一年）九月，张俊告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为变矣。”^⑩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也说：“桧……又谕张俊令劫王贵，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岳飞兵权。”^⑪这都从实质上说